

# 数字媒体下家庭语言政策的个案研究

冯帆<sup>1</sup> 汤琳琳<sup>2</sup>

(1.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 沈阳 110034;

2. 西北民族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 本文研究数字媒体下的家庭语言政策,通过对沈阳市三组家庭对孩子英语规划的田野调查,分析疫情对家庭语言意识、实践及管理三个维度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媒体在家庭场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对家庭语言政策产生了形塑作用,具体表现为:以家庭为中心所进行的语言规划意识得到强化,以网络为平台进行伴学式的自主性家庭语言管理显著增加,在语言实践的密度与频次增加的同时,其实践的内容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关键词]** 家庭语言政策; 数字媒体; 个案研究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05.163

Spolsky (2004) 在20世纪八十年代末正式提出家庭语言政策的概念,即“在家庭领域和家庭成员之间发生的一种特殊的语言使用模式和语言实践”。国内对其的研究自2000年开始,有以家庭语言为大规模语言调查的副产品的定量研究;也有通过个案研究来探讨家庭中的语言问题(康晓娟 2015; 李秀锦,刘媛媛 2016)的定性研究。但绝大多数仅涉及对单个核心家庭语言使用,而对宏观时代背景,特别是在现代教育技术日新月异、蓬勃发展影响下的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在学界尚虚位以待。本文以数字媒体的广泛应用为切入点,透视在其影响下的家庭语言政策的转变及呈现出的新特征。

## 1. 田野点概述

本文选取的沈阳市是辽宁省省会城市,位于辽宁省的中部,也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商贸的中心城市。对于以城市家庭为对象所进行的语言政策的研究来说,本研究田野点的选择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 2. 数据获取

本文所选取的三组家庭均在沈阳。笔者自2020年4月至8月分别进入三组家庭参与观察,并对家长进行访谈,共获取共计47小时的音像资料及3万字的田野笔记。将所获取的数据依照语言意识、语言管理及语言实践进行分类编码。我们还对家庭成员包括年龄、职业、学历及语言背景等相关信息进行了整理。

	家庭成员	年龄	职业	学历	语言背景
G家庭	父亲	39	政府职员	本科	汉语、英语
	母亲	37	翻译	本科	汉语、西班牙语
	孩子	7	学生	小学	汉语、英语
T家庭	父亲	38	电力工程师	博士	汉语、日语、英语
	母亲	38	私企职员	博士	汉语、日语、英语
	孩子1	8	学生	小学	汉语、英语、日语
	孩子2	6	学生	幼儿园	汉语、英语、日语
X家庭	父亲	40	大学教师	博士	汉语、英语
	母亲	36	大学教师	博士	汉语、英语
	孩子	6	学生	幼儿园	汉语、英语

## 3. 研究发现

研究发现,数字媒体时代对三组目标家庭在家庭语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具体表现为:语言意识有显著的增强,语言管理伴学化与网络化并存、语言实践密度、频次等维度上都得到了显著加强的同时,内容也得到了多元化的发展。

### 1.1 语言意识的强化

数字媒体的发展强化了家庭为单位进行的语言规划意识,家长在数字媒体影响下,认为家庭是孩子语言发展的重要场域,家长在这个过程之中对语言规划起到了主导的作用。

送孩子去线下英语班家长对教学内容、课堂表现都没有把握,网课就避免了这个问题。(G家庭)

这么多资源的情况下,我们更加意识到了家庭的重要性,家长其实成了子女语言教育的规划者,我们可以为孩子选择优化的资源配置,跨越地理区域的限制。(T家庭)

学校课程都相同的情况下,家就成了语言学习的主战场,我们家长就成了这个过程的核心和主导力量。(X家庭)

### 1.2 语言管理伴学化、网络化

数据显示以家为互动单元、家长伴学、网络为中心的资源及课程在家庭域中得到愈发广泛而系统性的应用。

我广泛查阅网课平台的资料,了解网课的信息,包括课程方的资质、教师的来源等信息,我也跟孩子一起上试听课,共同选外教。(G家庭)

之前我已经安排了一小部分英语网课,但课时不多,发现效果不错后,就有给孩子增加了外教一对一网课的频次。(T家庭)

我跟孩子对网课资源进行筛选、灵活运用,孩子进步很明显。(X家庭)

可见,以网络课程平台及相应资源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得到发展,网络课程平台以其跨越时空界限及灵活自主的资源共享方式获得了家庭场域中管理者的青睐。

### 1.3 语言实践密集化、多元化

数据显示语言实践形成了相对稳定及封闭的物理空间,语言实践呈现出频次密集化及形式多元化等特点。

在家里,我和孩子一起上外教的英语网课,课后我会根据上课的内容与孩子进行交流互动、还有给孩子设计一些游戏,比如表演猜词等等。(G家庭)

家里老大上完网课会主动教老二他学的单词、句子、儿歌和小故事,我会在旁边纠音,也会给他俩一起讲英文绘本。(T家庭)

我给他安排固定的时段训练,比如每天早晚,都会给孩子安排英语绘本的跟读时间。(X家庭)

家庭语言实践由于网课平台的介入不但在时间上得到了保证,而且在实践的密度与频次都有明显的增加,同时可以发现,家庭场域中语言实践的内容也由于网络平台资源的利用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规范与活化,无论是在亲子之间还是子女之间的语言实践形式都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特点。

## 4. 结论

本文旨在通过三组家庭在数字媒体影响下的家庭语言政策的调查洞察前者对后者的形塑作用。研究发现,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家庭语言规划意识形态的强化、出现伴学为主的网络化自主学习的语言管理模式以及语言实践频次密集化、内容多元化等三个维度。本文也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来佐证“自上而下”建构的语言政策的一种研究路径,希望对数字媒体广泛应用时代背景下的家庭语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一点个案的参照。

### 参考文献

- [1] Spolsky, B. 2004 Language Polic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 李秀锦, 刘媛媛. 家庭语言政策与儿童文化认同建构: 两例民族志研究个案报告 [J]. 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 2016 (2): 13-22.
  - [3] 康晓娟. 2015 海外华裔儿童华语学习、使用及其家庭语言规划调查研究——以马来西亚 3~6岁华裔儿童家庭为例 [J]. 语言文字应用 (2).
-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北方少数民族家庭语言使用研究”(2019—GMD—067)、西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城镇居民语言教育规划研究”(31920200055)阶段性成果。